



抗战文学的叙史考辨

□张武军



自胡适叙述新文学发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起,“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数量并不少,但是,“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1949年之后才建立。尽管1949年之前已经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教育,也诞生了为数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但是主要还是讲授者(如朱自清)、著作者的个人选择,体系化的完整的知识格局和教育格局尚不完整”(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民国文学”概念——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而且这些大多完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还无法贯穿整个抗战和抗战文学的历史。1940年代,有两部文学史涉及了抗战文学的叙述,分别是任访秋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蓝海1947年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但相对来说,这两部文学史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它们所蕴含的抗战观和文学史观,学界鲜有人论及。

任访秋1941年任教于河南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及习作”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上课的讲稿为基础而出版,遗憾的是只出版了上卷本。尽管这只是一部并不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其主要叙述的同样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文学,但该书整体框架、时段分期以及章节编排,涉及了抗战和抗战文学。任著把新文学划分为5个时期,即“初期试作的时代(1917—1920)”“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时代(1921—1925)”“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1926—1931)”“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代(1932—1937)”“抗战文学的时代(1937—1943)”。很显然,作者编著此书时抗战尚未结束,只能到1943年为止,值得注意的是,任著特别强调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像“五卅”“九一八”“七七事变”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以此作为文学史的分期点,而这些事件都和中日冲突,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相关。尤其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任著单独划分出一个时段,并以“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与民族主义时代”来概括,因为涉及这一部分具体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并未出版,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民族主义时代的“写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更加明确的所指。不过,根据这部文学史已有部分对国共两党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有意回避,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民族主义的时代”并非后来诸多文学史中所批判的“右翼”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有研究者这样定位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者站在民族的、抗战的立场,在提到当时已堕落为汉奸的周作人时,便用了‘周口口’,表示他不齿于人”(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正因为作者基于民族和抗战的立场,尽管作者使用民族主义时代而非抗战文艺来叙述“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的文学,尽管作者也把“七七事变”视为抗战文艺的起点,但无疑在迄今为止所编撰的文学史中,任著对“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文学版图最为重视,定位也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1947年蓝海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这是新文学史编撰中的第一部断代史,也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惟一的一部抗战文学史。作者只是在绪论和第一章简单陈述了“九一八”与“一二八”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除此以外抗战为主旨的文学史,主要叙述的还是“七七事变”算起的抗战期间的文学。因为急就章的缘故,内容不免有些粗疏;因为资料的匮乏,很多的文艺史实都有不少缺漏;因为战争的阻隔,一些地区像延安和沦陷区的文学基本没有涉及。但蓝著的价值在于展现了当时人心目中的抗战文学观,像“由前线主义到地方文艺的兴起”“活报与街头剧”“街头诗与朗诵诗”“速写与特写”“讲演文学与小小说阅读”“报告的产生”等等诸如如此的章节标题,在其他文学史中恐怕很难见到。仅从这些章节标题和文学类别来看,很显然,抗战时期“文学”和我们后来文学史书写的“抗战文学”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抗战文艺史》的价值不在于其保留或列举了多少文学史实,而在于它传达了抗战历史现场中大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式起步。新的学科,新的教程,新的文学史编纂,也水到渠成,且迫在眉睫。1951年7月,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署名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下文简称《大纲》)正式公布。《大纲》“绪论”部分,明确规定了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一、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二、新文学的扩展时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三、‘左联’成立前后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五、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会’(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毫无疑问,这

样的章节目录,这样的分期和体例编排,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新文化的论述基本吻合,也凸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重要性。

《大纲》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纲》所设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成为诸多文学史教程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就在教育部组织制定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同时,《大纲》编写者之一的王瑶,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两册的编纂。这是第一部贯穿新文学30余年的文学史著作,也是一部对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文学史著作,和《大纲》基本一致,王瑶同样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为指导,把1949年之前的文学划分为4个阶段。不过,王瑶的文学史很快就被“不够革命”而受到诸多批判,此后的文学史“急速政治化”,像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一次鲜明地以中国革命史为纲,把新文学史作为革命史的一个部分来写(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毫无疑问,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开始,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到高度政治化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包括其后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及始于1960年代由唐弢领衔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这些文学史都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为理论指导,都以“左联”十年的革命文学,以及之后的解放区文学为主线,而抗战文学为了凸显《讲话》的重要性又被截分为两个阶段。这些文学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抗战和抗战史观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叙述的影响,而且抗战和抗战文学也被编码到“解放区文学”和《讲话》意义的阐述之中。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史开启新一轮的编史热,并最终形成了颇为壮观的重写文学史浪潮,直至今日,重写文学史的构想(反思)和实践仍在继续。众所周知,重写文学史的大旗当属钱理群和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下文简称《三十年》)则是重写文学史的开创性成果。“把《三十年》和王瑶、唐弢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含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具有编写者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文学理念的时期变迁。”(洪子诚:《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确,不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提出,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编撰,都体现了文学评判从政治标准向学术标准的转变,文学史书写从革命史观到现代性史观的转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钱理群也承认说:《三十年》一书就因为我的关系,而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有了某种联系”(钱理群:《矛盾与困惑的写作》)。作为深受20世纪文学观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编排体系和分期同样直接借用概念来区隔,如第一编为“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第二编为“第二个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三编为“第三个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这三个十年的划分,仅仅只是时间意义的映照,回避了以往文学史有关政治和革命意义的标识,和20世纪中国文学对整体时间意义的强调一样,“时间”概念背后都被赋予了一系列的现代性指向,有关这一点,学界已有不少论述(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尽管《三十年》试图构建新的现代性史观,尤其是一些具体章节因为基于审美性、现代性的评判,和之前文学史相比有很大突破,但从整体的叙述框架上,从分期的时间点上,《三十年》之前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为指导的诸多文学史,区别并不明显。自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事实上暗合了新文学(现代文学)30年的时段区分,尤其是前两个十年的划分,《三十年》和之前文学史的时间起止点完全一致。《三十年》最大的突破在于第三个十年的整体叙述,过去的文学史都特别强调《讲话》的意义,并以此作为重要的文学时段分割点。例如王瑶曾专门解释他的文学史分期依据,“我们不以抗战八年为一期,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期的界线,因为这句话太重要了;解决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许多问题,使文学运动和作家的实践都有了明确方向”(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毫无疑问《三十年》不再因强调《讲话》而把最后一个十年的文学分为抗战前期和后期,这体现了《三十年》对文学性的重视,对文学从属政治的淡

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十年》有关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叙述和分期,同样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依据,同样以1928年的革命思潮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来区隔不同的文学时期。总的叙述框架上,《三十年》以重大政治事件支配文学史的叙述,与其所努力建构的文学性和现代性叙述范式,形成了不小的反差。这也是《三十年》出来后,有学者们所评价的那样,“在新的文学史观及其研究方法与传统史的框架之间”(赵京华:《共同谋求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突破》)。

如果说,《三十年》尚“带着明显的历史过渡色彩”(赵京华:《共同谋求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突破》),那么时至今日,重写文学史已开展了近40年,早已越过了《三十年》编写时的历史过渡期,《三十年》也几经修订再版。回过头来,我们再重新审视一系列文学史著述,不论是基于革命史观的叙述范式,还是诉诸纯文学性、现代性史观的历史表述,不管是强调革命政治的主导地位,还是回归纯文学的价值评判,以重大政治事件来引领文学史叙述,依然是大家共同的选择。甚至彼此之间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研究者和文学史编著者,他们在现代文学30年的划分上,是出奇的一致。丁望在为《文学史话》写的序言中,有关新文学的分期,第一阶段“起步时期”,第二阶段“丰收时期”,第三阶段“战争文学时期”,这样的划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史,和《三十年》完全一致。丁望也专门阐述道:“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福祸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史——这是有异于外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丁望《文学史话》序)“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也是海外学者夏志清“专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收录在他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附录中。虽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各个版本中反复声称,“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但他的小说史同样是以1928年和1937年这样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来做文学史的分期点。同样的例证还见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写完有关30年代文学内容的中册后,他在《跋》中表明自己的文学史编写首要信条,“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虽然他有关新文学“诞生期”“成长期”“收获期”“凋零期”的提法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但1928年和1937年同样是他文学史最为重要的分界点。

众所周知,抗战文学是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很显然,我们姑且搁置有关“抗战文学”更为内在的性质辨析,抗战文学首先是以时段命名的概念,就像有学者所说,“抗战文学就是抗战时期的文学,犹如‘五四文学’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一样”(苏光文:《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显然,近些年对于抗战的起止时间有了新的共识。但是,1937年作为抗战的起点,近些年来受到了史学界的一再质疑。不论是“中国抗战史学界”,还是“中日历史学界”,抑或是二战史研究界,大家都把“九一八”事变视为日本大规模侵华和中国人民抗战的起点,共同认可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战。

十四年抗战史观意味着新的抗战起始时间,也意味着抗战文学时段要有相应的调整,这样的调整无疑会打破以往文学史叙述带来巨大冲击。学者李怡对近些年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评述,他总结道:“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将文学研究置于更大的历史文化场景,在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广泛对话中发掘各种‘文化意味’”(李怡:《文史对话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在文史对话不断推动现代文学研究愈发深入愈发丰富的当下,面对历史学界已然达成“十四年抗战史观”的共识,我们显然不能无视之,因此,如何重叙抗战文学的历史,进而如何面对新的抗战史观带给现代文学既有阐释框架的冲击,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命题。当然,这并非把史学界的十四年抗战观简单移植到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就万事大吉,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促使我们真正回到抗战的历史和抗战文学的历史,在文史对话中重新认知抗战和抗战文学。因为,过去我们对抗战文学的发生,有关抗战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太过模糊了,大家都认为抗战文学不就随着抗战的爆发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可是,抗战爆发的时间点有了新的共识,抗战文学还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吗?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事关抗战文学自身的命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对现代文学叙述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

又看到了范玉刚的新著,异常欣喜。这些年来,他每年都有新著问世,一直看到他的成功,他的勤奋,他的努力;也看到他的勤勉和他对学术事业的执著。

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文化实践的如火如荼,中国文化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时代。相对此前文化实践一直在理论探索的前面,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建构呼声反映了学界迫切改变尴尬局面的某种焦虑,压力促使中国学人不断增强理论探索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理论研究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的方位和新发展阶段,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正在成为学界理论学人的追求,建构中国学派的呼声日渐高涨。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国实践,在有效阐释中国发展现实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相互通约,与国际文化研究诸多学派展开交流对话,迫切需要在扎实学理研究和强烈现实关怀中做出不负时代的理论创新。正是在这种境遇下,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范玉刚教授的新著《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体现出一种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现实的强烈的理论探索冲动,是一本行走在文化研究“中国学派”建构途中的理论力作。

该书由导论、八个章节以及结语等部分构成,从整体上对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作了系统性阐释,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消解,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的迫切性,主导文化繁荣发展,主流文化价值观传播体系研究,全媒体语境下主流话语体系的建构,以价值共享讲好“一带一路”建设故事等话题,并围绕如何增强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与传播的有效性,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作者将着力点放在“增强全球文化语境下的主导文化建构能力”和“以加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上,体现出一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国家文化发展的高远的战略意识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之可能的一种积极探索。

从选题上看,该课题研究契合时代需求,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切近。在作者看来,文化关涉人和人的发展,价值观又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特别是新一轮全球化凸显的特点,以及国内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既难得又有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可以说,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和传播是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这是一个涉及增强国家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课题。尽管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多有论著面世,但大而化之的泛泛“高”论和就事论事的想当然的功利性“策”论居多,从价值本体论的角度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研究实践路径的尚不多见,本书的出版在此方面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使之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定海神针。对于进入新时代繁荣发展的中国来讲,如何加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需要在研究范式上另辟蹊径,需要以理论创新驱动文化研究“中国学派”的建构。恰恰在这方面显现出作者的独具匠心,以及文化理论探索的心得。

由于课题本身的主题宏大、内容广泛,有着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和理论难度,本书作者在长期准备的基础上,怀着文化理论研究的强烈的开拓创新意识,进行了严肃的探索。具体来看,本书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坚持了全球视野、世界眼光、中国文化主体性立场:首先,论著分析了全球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针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提出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问题;其次,在国家“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以及在文化强国战略实施中,以“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为轴心展开多层次分类别的论述,对应当前价值观建构和传播中遭遇的诸多难题,以文化市场为逻辑起点,对主流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构成及其细分市场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提出全媒体时代建构现代话语传播体系的紧迫性;最后,把课题研究重心落在增强全球文化语境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能力上,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及其政策性建议。全书在详实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以增强文化认同为最高目标,以世界共同价值诉求为底蕴,以文化创新和民族文化高位态的提升为价值取向的诸多原则,作为推动文化研究“中国学派”建构的积极探索。本书作者非常强调文化发展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强调文化价值共享和文明的可通约性。

从全书的理论旨趣来看,本书决不是书斋里的逻辑推演,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该书的立意显然是为了着眼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的有效性,旨在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建构出清晰明确的全社会广泛践行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整合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大众思想,使之在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竞争中胜出并发挥引导作用,使之在精神上助力中国文明新崛起,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球高势能文化,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一定程度上,在文明互鉴视野下探讨了全球文化语境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问题,也是有效回应了海外受众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为何的关切,从而使本书显现出一种独到的理论价值。

本书的理论价值一是体现在文化理论界域的大力拓展。该书提出,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在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倡导文明互鉴、文明通约和文明共识,在特色弘扬中彰显一般性价值,是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与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的结果。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显现了跨文化理论比较的自觉。通过与当代西方和世界其他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比较,阐释他们的共通之处,让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进入世界文化语境,平等地参与全球对话,走向世界。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为当前解决许多世界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思路和方案。

另外,本书还提出了一些具有独特理论意味的重要观点:只有主流文化价值观在社会上凝聚人心、真正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整个社会才能形成一种蓬勃向上的精气神,才能形成全社会的一种精神之“强”,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兆。

主流文化的价值诉求要以社会公共价值为基础,不能脱离价值共识的支撑,否则就会沦为自说自话;也不能脱离大众日常生活的常识、常情、常德,否则就会在架空中沦为空靶子。

文化影响力是通过文化产品在市场上被大众实实在在的实现的,需要靠文化贸易数字说话,需要分众化传播下的价值全覆盖。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的份额决定了文化的话语权。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并不是一个大词,它就在大众点滴的日常践履中。

人类经验表明,只有在现代文明视野中建构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才能传播得深远,也就是说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要做到既与世界通行的主流价值相兼容,又要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传统文化的底色,并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又能提供全民共享的价值。基于此,该书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 1.有效建构和传播主流文化价值观,需要借助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文化贸易的提质增效中理顺文化安全与文化贸易的关系。
- 2.加强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建设。
- 3.在人类文明互鉴视野中增强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和传播能力。

总体上看,该书不仅在理论探索上具有学术价值,还在强化应用价值上体现出很好的社会效益。在基础理论方面,该书对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作系统性阐释,有助于深化文化基本理论和文化价值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上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创新和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当前文化建设的一些现实问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构建和传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文化,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交流、交锋和交融进程中,实现自身发展、提高世界文化影响力、凝聚力的关键,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应用价值的问题。该书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浓墨重彩地探讨了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与传播的有效性载体和路径,提出了增强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和传播能力的对策建议。这些立足实践提出的对策性建议,对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文化建设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是本书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基础。因而,该书的出版会引发社会和学界进一步关注“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与传播”问题。

行走在文化研究「中国学派」建构途中的重要著作
——评范玉刚《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
□金元浦